

红七十四师转战豫陕边

秦芸



整装待发的红军指战员

红七十四师是在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后，由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的余部建立起来的。红七十四师建立后，在与上级失去联系、极端困苦条件下，不仅带领根据地人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剿”，取得游击战争的重大胜利，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行动，而且在与敌人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部队由最初的700余人迅速发展发展到2000余人。

三次反“围攻”

1935年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中共鄂豫陕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动离开鄂豫陕苏区西征，准备与主力红军会师。国民党军在获悉红二十五军主力离开陕南进入甘肅境内的消息后，遂于7月17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外，集中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根据地实施“划区清剿”，妄图以“分割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

9月9日，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的负责人在商南县梁家坟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陕南特委（后根据中央指示改称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鄂豫陕边革命斗争，新的鄂豫陕特委以郑位三为书记，陈先瑞为常委；合编各游击武装，组建红七十四师作为坚守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确定作战方针是游击战，采取回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灵活机动，扬长避短，不同强敌正面接触，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据此，10月6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成立，由陈先瑞任师长，下辖两个营和手枪团、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约700人。

12月初，鄂豫陕特委率领红七十四师到镇安县青桐关以东的月西沟。这时国民党第四十军部队已先期到达青桐关，堵住红七十四师的进路，而另一支国民党部队正从后面紧紧追来，企图前后夹击，消灭红七十四师。特委决定利用青桐关山峰陡峭、谷深路隘、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和尾追之敌尚远的时机，以小股兵力在月西沟诱敌，主力在青桐关设伏，消灭前方堵截之敌，为继续前进打开道路。

红七十四师五团一营、二营隐

藏在李家山、万家山，主力埋伏在月西沟，布成一个“口袋阵”。手枪团两个班直插青桐关，主动诱敌出关。青桐关守敌果然中计，两个连以密集队形顺沟内开进。红七十四师一营在左，二营在右，手枪团两个班断后，给进入伏击圈之敌以猛烈打击，将敌人消灭殆尽。此战，红七十四师毙伤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180余支，轻机枪4挺。

青桐关伏击战取胜后，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又挥师陕南，进入镇安、柞水、宁陕三县交界的菩萨店，建立了菩萨店区苏维埃政府。12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继续西进，于26日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宁陕县城，将该县城的守敌全部缴械，活捉了敌县长。随后，红七十四师以宁陕、佛坪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起工农政权。国民党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一次“围攻”宣告失败，鄂豫陕根据地的局势趋于好转。

1936年2月，敌人又调集17个团的兵力，以“严密封锁结合跟踪”的战术，对红七十四师发动第二次“围攻”，企图消灭红七十四师于宁佛地区。红七十四师发觉敌人的企图后，迅速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凤县挺进，沿宝汉公路西下，在黄牛铺等地消灭敌保安团400余人，缴获枪支300余支。行军途中，每到一地，红七十四师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给贫困群众分粮分物。

凤县是西安通往汉中的要道，得知县城被红军攻克，国民党大为恐慌，随即抽调10个团的兵力追击，红七十四师得到消息后立即急速东进，越过太白山，直抵鄂豫边的西坪、荆紫关等地，于4月上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重返商南县梁家坟。至此，国民党军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二次“围攻”以失败告终。在梁家坟，红七十四师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整训学习，并召开会议，学习中央文件，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央新的政策问题。

1936年5月中旬，敌人又调动了约20个团的兵力，对红七十四师发动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国民

党军采取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相结合的方法，以一个团的兵力驻守县城和交通要道，在经济上严密控制陕南行人和物资流通，同时组织5到7个团的“追剿军”机动作战，企图在3个月内困死红军。

为争取主动，红七十四师将部队编为第一、第五、第六团。其中，第一团在老根据地继续开展游击战；第五团前往汉水北岸的新游击区；第六团奇袭褒鸡，引敌西进，将敌人引开后东返。5月至8月，红军3个团密切配合，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四处打击敌人的驻守部队，破坏敌人的交通补给，让参加“追剿”的敌人疲于奔命。红七十四师以实际行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红军已在陕南彻底消灭”的谎言，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斗争情绪，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9月，国民党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三次“围攻”宣告失败。

转战灵宝朱阳地区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长征到甘南后发动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战役，国民党在陕南东部的军队大部西调，围堵红二方面军北上。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鄂豫陕特委将红七十四师的三个团集中起来，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牵制敌军于外线，有力地策应了红二方面军北上。

11月中旬，红七十四师进至豫陕边，在富水关与大批敌人遭遇。红七十四师立即投入战斗，激战近1小时，毙敌近百人，取得富水关大捷。随后，红七十四师沿豫陕边北上，转入洛南，歼灭灵口、石家坡民团，来到华山脚下转了3个大圈，并派手枪团50多名战士登上华山，张贴标语以迷惑敌人。红军“闹华山”的消息不胫而走，搞得国民党周边驻军和保安团纷纷向西告急。

1936年12月11日，红七十四师一部经木桐沟进入朱阳镇的下河、秦池一带，把当地的地方保安团击溃。第二天，红七十四师经大村到新店，消灭了在这一带为非作歹的国民党反

动地方武装“黑衣队”，随后乘胜追击，击溃朱阳镇上的保安队。此后，红七十四师向陕西省洛南县陈耳沟迂回，沿路不但把各地的反动武装消灭殆尽，还消灭了尾随而来的国民党正规军数百人。

阻止国民党部队入陕

西安事变爆发后，“围剿”红七十四师的国民党军不知所措。中共鄂豫陕特委、红七十四师在蓝田暂时休整。

1936年12月21日，原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统战部部长、西安事变前被派往杨虎城部工作的李涛在蓝田县张家坪与红七十四师取得联系。次日，中共鄂豫陕特委在灞龙庙召开扩大会议，由李涛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介绍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2月24日，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红七十四师改编为“抗日南路军”（对内仍称红七十四师）。

1937年1月，“抗日南路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东开拔，进至潼关、灵宝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部队入陕。同月22日，“抗日南路军”和第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归第十五军团指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5日，第十五军团奉命撤离商县。2月8日，“抗日南路军”复用红七十四师番号，奉命移驻长安县大峪口进行整训。这时，全师已发展到2100余人。

从1935年7月到1936年12月，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和敌人20多个团以及地方武装3万余人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人的三次“围攻”，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人，缴获各种枪3000余支。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七十四师奉命调往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23日，红七十四师在三原县城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留守处，后被改编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四团和警备二团，承担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北京市文史研究者）



史海
观澜

全面抗战爆发后，鲍夫受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投笔从戎，来到华北抗日前线，找到冀南行署主任兼冀南游击队司令杨秀峰，要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鲍夫参加冀北游击队，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游击队中，他先后任青年股长、宣教科长。鲍夫性格开朗，感情奔放，把机关和部队的文化搞得非常活跃。他平时深入基层和战士打成一片，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

1940年，鲍夫任三支队区队教导员，参加了临城以西蝎子沟战斗。战斗中，他在冀游首长的指挥下，周密布置，合理安排兵力，将优势兵力的敌人牢牢围困在山谷中。战斗中，鲍夫见敌人准备向后逃窜，当即率领战士们跃出战壕，冲向敌群。经过激烈的白刃战，敌人招架不住，被打得四处溃散，鲍夫带领战士们乘胜追击，俘虏100多个敌人，胜利完成了此次任务。

此后，上级调任鲍夫到晋东武工队工作。在晋东武工队，鲍夫头戴毛巾，身着紫花粗布便服，腰里挂着一支盒子枪，以武装工作队员打扮出现



史海
观澜

1939年11月，李先念等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工作和抗日武装。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编组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立即向鄂中地区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创了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彭思桥是位于鄂皖边蕲春、浠水两县接壤处的一个边界集镇。这里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0年7月19日，为击破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对鄂东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百日围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鄂东独立团在彭思桥地区消灭了参加“围剿”的顽军两个分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鄂皖边各县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三月围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反共气焰嚣张。为配合苏皖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鄂东独立团进入鄂皖边。3月，第九团到达彭思桥地区。当时，该地区除驻有顽固反共的国民

党鄂东第十七纵队外，还驻有国民党五战区第二纵队。由于所属派系不同，第二纵队屡受鄂东第十七纵队的歧视，双方矛盾很深。根据这些情况，第九团决定利用顽军的内部矛盾，对第二纵队开展统战工作，孤立第十七纵队。3月12日，第九团在彭思桥以东地区向国民党顽军部队展开自卫反击作战。战斗打响后，第九团发现顽军守军中有第二纵队的一个中队。根据这一情况，第九团政工组立即对该部开展战场统战工作，组织战士对他们喊话，并送信过去，说明新四军对第二纵队的态度，答应在包围中留一条路让他们撤退。正在交涉时，沈部两个中队赶来增援，向第九团阵地发动偷袭，第九团立即予以反击。经激战，第二纵队援军被第九团击溃，指挥官沈训谟以下50余人被俘。第九团团长吴昆与团政治部主任张文生亲自做沈训谟等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并劝告他们不要受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唆，与人民为敌。沈训谟及被俘官兵深受感动，在第九团指挥员面前表示：绝对不再参加反共内战。第九团当即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并解除包围，让被围的第二纵队一个中队和沈训谟共同撤走。随后，其余被围国民党顽军部队在第九团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当时，该地区除驻有顽固反共的国民

鲍夫战斗在临城

梁银安

在群众中间。

1942年10月，鲍夫从晋东武工队调到临城县独立营，任政委兼代理县委书记。上任后，鲍夫结合自己在晋东地区的斗争经验，依靠当地群众，积极进行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在他的带领下，临城地方武装和民兵进行了整顿，并针对敌人的“囚笼政策”，普遍建立起兵民联防机制——敌人不来就帮助群众搞生产，敌人来了就掩护群众撤退，瞅准机会就打。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鲍夫带领部队走遍了临城的山山水水，历尽了无数艰难困苦，坚持和敌人开展斗争。他按照上级“敌进我进”的要求，亲自率领武工队和县独立营深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人的据点炮楼，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他还积极开展在敌人内部的敌工工作，建立“内线”，争取了多个据点的伪军起义投诚。到1944年，在鲍夫的带领下，临城抗日军民基本粉碎了敌人的“囚笼政策”，打开了临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4年11月，鲍夫率领两个班在前往游击区一个村子时，途中和大批日伪军遭遇。为掩护村中群众转移，鲍夫和4位同志英勇阻击敌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

彭思桥战斗：统战工作显威力

刘思琪

1939年11月，李先念等召集鄂中、鄂豫皖、豫南三个区党委负责人会议，组建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的工作和抗日武装。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个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编组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成立后，立即向鄂中地区的日伪军发起攻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击国民党顽固派对豫鄂边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开创了豫鄂边区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彭思桥是位于鄂皖边蕲春、浠水两县接壤处的一个边界集镇。这里地理条件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0年7月19日，为击破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程汝怀对鄂东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百日围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鄂东独立团在彭思桥地区消灭了参加“围剿”的顽军两个分队。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鄂皖边各县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三月围剿”，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人士，反共气焰嚣张。为配合苏皖兄弟部队的反顽斗争，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派鄂东独立团进入鄂皖边。3月，第九团到达彭思桥地区。当时，该地区除驻有顽固反共的国民

党鄂东第十七纵队外，还驻有国民党五战区第二纵队。由于所属派系不同，第二纵队屡受鄂东第十七纵队的歧视，双方矛盾很深。根据这些情况，第九团决定利用顽军的内部矛盾，对第二纵队开展统战工作，孤立第十七纵队。3月12日，第九团在彭思桥以东地区向国民党顽军部队展开自卫反击作战。战斗打响后，第九团发现顽军守军中有第二纵队的一个中队。根据这一情况，第九团政工组立即对该部开展战场统战工作，组织战士对他们喊话，并送信过去，说明新四军对第二纵队的态度，答应在包围中留一条路让他们撤退。正在交涉时，沈部两个中队赶来增援，向第九团阵地发动偷袭，第九团立即予以反击。经激战，第二纵队援军被第九团击溃，指挥官沈训谟以下50余人被俘。第九团团长吴昆与团政治部主任张文生亲自做沈训谟等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并劝告他们不要受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唆，与人民为敌。沈训谟及被俘官兵深受感动，在第九团指挥员面前表示：绝对不再参加反共内战。第九团当即释放了全部被俘人员，并解除包围，让被围的第二纵队一个中队和沈训谟共同撤走。随后，其余被围国民党顽军部队在第九团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

当时，该地区除驻有顽固反共的国民

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

贾晓明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山东省委制定了在全省分地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和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十条纲领”，迅速派遣千余部分赴各地组织实施。10月下旬，共产党员姚仲明奉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来到长山中学。他以长山中学国文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校长马耀南的密切配合下，会同长山中学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以长山中学为中心，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11月初，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来了廖容标和赵明新，并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以姚仲明为组长的直属省委领导的中共长山中学特别小组。

在马耀南的积极支持下，他们抵制了国民党教育厅关于长山中学南迁的命令，挫败了特务分子的破坏活动，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在教职员中成立了“教学研究会”，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团结教职员工。

11月下旬，他们又以开办“民众夜校”为掩护，举办了游击战骨干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60多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长山中学师生和训练班学员中发展了一批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吸收李寿令等人入党，壮大了长山中学抗日骨干力量。另外，他们还创办了《抗战小报》，在学生中组织成立了“抗日讲演会”，带领学生到街头和农村讲演，宣传抗日。马耀南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联络地方各界人士成立了“长山山抗敌后援会”。

在积极做好抗日武装起义组织准备的同时，中共长山中学特别小组经过慎重考虑，选定紧靠黑铁山的长山九区作为武装起义的地方，并派赵明新、魏思文到长山九区开展党的工作，建立花山党支部，为举行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1937年12月23日，日军飞机轰炸了长山县城，炸弹落在了长山中学和县政府附近。国民党县政府和县武装大

队随之南逃，社会一片混乱。与此同时，日军南渡黄河，逼近长山。24日，中共长山中学特别小组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决定：把师生拉到长山九区的卫固一带打游击。

姚仲明、廖容标等人派20余名进步学生先行一步，同长山九区的孙铁民等人取得联系；马耀南赴二区和八区联络人员和筹备粮款。随后，廖容标、姚仲明率领长山中学师生转移到长山城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对武装起义计划作了布置。当晚，他们率领60多名自愿抗日的师生奔赴长山九区。25日，一行到达黑铁山下太平庄，同提前到达的赵明新、周次温等人会合，宣布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12月26日夜，由长山中学师生和当地“民先”队员、抗日积极分子组成100多人的起义队伍，集合在太平庄小学校院子里，姚仲明宣读了《告同胞书》，举行庄严的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仪式。

27日黎明，起义部队登上了黑铁山，打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旗帜。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由廖容标任司令员，姚仲明任政治委员，赵明新任政治部主任。几天后，马耀南和原长山县保安大队携带武器先后赶到太平庄。不久，马耀南担任了起义部队的参谋长和临时行动委员会主任。在马耀南、赵明新等的动员下，附近群众纷纷慷慨解囊，每天都向第五军送给养和粮食。

黑铁山起义不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进行了统编，随后，高光宇、孟金山等人领导的工人抗日游击队，张冲波、孙铁民等人领导的农民抗日自卫队也加入进来，起义部队迅速壮大。

1938年1月8日，起义部队夜袭长山，首战告捷，一举歼灭了伪长山县维持会，俘虏汉奸30多人，缴枪17支。1月19日，他们又在小清河陶塘口设埋伏，击沉日军汽艇一艘，全歼艇上日军。此后，黑铁山起义部队又在周村以西白云山麓的三官庙一带，以100余人于日伪军400多人激战一天，毙伤日军百余人。起义部队连战连捷，声威大震，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信心。各地的爱国志士和抗日武装队伍纷纷投奔黑铁山起义部队。不到半年，这支人民抗日武装队伍就发展到30多个中队，近6000人。



史海
观澜

组，连夜赶往寨上镇，待敌人通过时间发动袭击，夺取武器，用以武装工人团。

第二天天一亮，行动小组一行8人化装成商人和小贩，分别来到兴隆街上，在一个繁华的路口处等待敌人的到来。不一会儿，12个敌人排着队沿街走来，每人都肩扛一支“三八大盖”。当敌人的队伍走到李焕文身边时，李焕文发出行动暗号。张文友、李连绥、王德富3人立即动手“打了起来”，招来不少人围观。当日日本兵排成纵队走到“打架现场”附近时，受到聚集人群的阻挡，步伐慢了下來，也伸着脑袋看“热闹”。张文友、李连绥、王德富3人见势，立即扭打着冲进敌人的队伍，把队伍冲散。随着王绍义将草帽向天一掷，行动小组的其他组员迅速向各自指定的目标扑过去，用事先准备好的扁担、木棍、铁锹向敌人打去，瞬间就打倒了8个敌人。没等其余4个敌人明白过来，战士们就合力猛扑上去，和他们扭打在一起。经过激烈而短暂的搏斗，4个敌人也被打得倒地不起。

随着王绍义的一声大喊，战士们立即扛起缴获的12支“三八大盖”撤到河边，上了接应的小木船，安全撤回了根据地。

1945年7月，根据中共冀热辽区党委关于人民武装建设决定的指示精神，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决定在路南(北宁铁路以南)抽调部分原抗日民族先锋队队员为骨干，与报名参军的青年一起组建一支地方部队，取名盐区抗日工人团，政委由中共丰玉宁联合县委书记艾群兼任，副政委王克林，团长艾群，副团长王绍义。